

張其昀教授著

中華歷代大教育家史畧

蔣中正簽

中華歷代大教育家史略

張其昀 著

中華歷代大教育家史略

目次

一、孔子		一
二、孟子		四
三、荀子		六
四、董仲舒		八
五、王通		九
六、韓愈		一
七、胡瑗		三
八、程灝		四

中華歷代大教育家史略

二

九、程頤

.....二四

十、朱熹

.....二七

十一、陸九淵

.....三三

十二、王守仁

.....三六

中華歷代大教育家史略

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，也是中國史上一位最偉大的教師，其教育學說有精密的理論，和一貫的系統。他以為政治必須以教育為本源，所以他的教育哲學就是他的政治哲學。其言足為天下法，其行足為百世師。孔子學說經過孟子、荀子、董仲舒、王通、韓愈、胡瑗、程顥、程頤、朱熹、陸九淵、王守仁等之紹述而益發揚光大。二千多年以來，儒學思想是中國思想界的主流，也是中國文化的大動脈。茲當孔子誕生二千五百週年紀念，國家正處於空前未有的變局，我們試從血脈上來探究中國文化的本質，把孔子以降十二位聖哲大師的遺教，涵泳體察一番，實在可以得到無窮的啓發和鼓勵，這原是孔子所謂「溫故知新」的旨趣。

(一) 孔子

(元前五五——四七九)

孔子集中中國古代文化之大成。中國遠古之民族理想載於經典者已極深厚，惟皆僅具大綱，至孔子始歸納之使成為系統，深究之使成為理論。孔子曰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此一貫之道名曰仁。仁乃做人的道理，是謂人格；亦即立國之基本，是為國格。仁為諸德之統一原理，而具有最高之價值。孔子以為教育與政治之最後目的在於仁之實現。在教育方面我們應該以修己之道教誨他人，使他人得以從事於修己。孔子教

育弟子，即注重道德的實踐，以完成其人格，能自立立人者方稱爲士。在政治上應該實行忠恕之道，以謀理想社會之實現。孔子最重視政治道德，於經濟軍事自然並不輕視，但如食兵信三者必不得已而須裁減時，他主張先去兵，次去食，惟有信義不能去。他說：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孔子哲學是人本哲學，他於人生方面有獨到的見解，他的學說確可代表中國民族性。全世界對於人生取忠實態度的人士，今後於孔子學說深信必能感到同情與興奮。

孔子的教學方法稱爲六藝教育。六藝者曰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。禮是適度的自由，過與不及的準則。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，只須其合理即爲至善。孔子注重人之真性情，惡虛僞，尙質直，故論語中屢言直。孔子曰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不仁之人無真性情，雖行禮樂之文，適足增其虛僞耳。孔子於音樂，用力勤而興味濃。如「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」其於音樂的欣賞，如此深摯。射御二項爲古代軍事之訓練，書數二項則爲文藝教育。孔子射於圃，觀者如堵牆。他曾說：「我戰則克。」蓋有文事者必有武備，他所欲造就的人才足見危授命殺身成仁的志士。我國古代教育本爲文武合一的教育，觀禮記儒行篇所云，大都慷慨任俠，具有陽剛之美者。六藝教育的主要精神至今依然是朝氣蓬勃的精神源泉。

孔子自稱述而不作，其實乃以述爲作。他的貢獻在於整理文獻，疏通證明，尤其對於春秋一書，把古代史官的書法歸納爲正名二字，闡揚民族的大義，後世盡忠愛國之說率以此爲準繩。春秋之義，內修外攘

，尊主討賊是也。蓋欲外抗強國，必先內修政治，欲外求獨立，必先內求統一。中華民族擁有與歐洲相埒之版圖與世界四分之一之人口，其所以能團結一致獨立不墮者，實在可說是春秋大義名分之所賜。孔子曰：「知我者惟春秋，罪我者惟春秋。」知之者，知其明盡忠之義；罪之者，罪其彰討逆之迹也。中華民國不許有任何傀儡組織，有之則必受精神上最嚴厲的制裁，爲全民族所共棄，而歸於消滅。春秋筆法其權威有甚於武力者。

孔子不否認治國應有良好的制度和適宜的改革，但他堅信任何政策制度必須由好人去運用推行纔收能效。他曾說：「爲政在人，」又說「人能弘道。」就理論而言，政治既是一種弘道的活動，所謂「政者，正也，」如果從政的人本身不正，這個活動便失去了意義，而不成其爲政治。就事實而言，要人民服從政府的指導，必須政府言行相顧，纔能取信于民。子路問政，孔子說：「先之，勞之。」便是說，凡民之行，以身先之，則不令而行。凡民之事，以身勞之，則雖勤不怨。這是孔子對於政治家的期望。

論語一書爲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之紀錄。孔子爲一天真而富於風趣之人，惟其機趣之流露，適如其分，有蘊藉不盡之妙。觀其與門弟子問答周旋，雖平易近人，而感動至深，於此可見孔子之真面目。孔子曰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這可算是他的自傳。大抵孔子當三十而立之年，始講學授徒，此後四十餘年，都是爲學不厭，誨人不倦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的教師生活。其高足弟子，皆終身形影相隨，患難與共，子路死則哭之，顏淵死則

哭之慟。孔子既歿，弟子廬墓三年，子貢則六年，師生間感情之深如此。孔子學說經無數之後學發揚光大，歷時愈久，影響愈大，即東至韓國、日本，南至中南半島，皆被孔子之教澤，設孔子廟，行釋奠禮，孔子誕日實爲世界上最悠久最普遍最隆重之教師節。

(二) 孟子

(元前三九〇——三〇五)

孟子承孔子子思之學說而推闡之，其一生之職志爲繼孔子之業。孟子生於戰國之世，其時百家爭鳴，墨家與道家之勢力，尤足與儒家相抗衡。孟子最大之貢獻爲拒楊墨。(楊朱代表道家思想)其言曰：「今天下不之楊而之墨，楊墨交亂，而聖人之道不明。故曰能言拒楊墨者，聖人之徒也。」他要廓清思想上的異端，對於孔子之學說當然需有進一步的建設。道墨二家與孔學沒大之異點有二：一爲關於自由。道家主放任，墨家主統制，各趨極端。儒家尙中庸，折衷於兩者之間，適度之自由名之曰禮。一爲關於平等。墨家但兼愛，道家倡齊物，皆欲泯除差等而主張絕對的平等。孟子以爲「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。」(荀子亦有「淮齊非齊」之說。)人類的天賦和天職，本是不平等的，強不齊以爲齊，其結果爲假平等。當時「楊墨塞路，孟子辭而闢之，」就是倡真平等的學說來駁斥假平等。真正的平等需要適宜的秩序，名之曰義。孔子以仁爲最高價值，孟子則配之以義，而稱爲仁義。西洋歷史以自由觀念爲中心，但至二十世紀個人自由主義已顯見衰落。自由與平等有不可分性，兩者若不加節制，流弊不可勝言。如何將自由與組織，平等

與秩序，調和適中，確保平衡，這是世界最新的思潮，其實亦是儒家學說最基本的概念。

孟子之仁義學說，根據於其性命二者之研究。「良知」「良心」「本心」之說皆發源於孟子，其涵義與性爲一事。孟子以爲人類除自然的本能以外，還有一種社會意識，即辨別是非的能力。其餘的本能固然與禽獸無異，惟有這種求是精神，由羣體生出來的道德觀念，確是人格的基礎。不過良知良能只是一種善端，由此爲起點，而達到道德的最高標準，還要用人爲工夫去擴充它，完成它。故曰：「聖人與人同類者。」又曰：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爲者亦若是。」可見孟子不承認人類天賦的平等，而極力主張用教育方法達到真正的平等。孟子所謂「命」，是指自然環境而言，他以爲人力可改造環境，也就是人力可創造命運，人類之尊嚴在此，教育之價值亦在此。

自孔子發揮民族之大義，孟子繼之而倡民權、民生之學說，這也是應有之結論。蓋平等之義無他，在於排除社會制度中所生之障礙，由漸小以至於絕無。孟子創民貴君輕之說，以提倡民權思想，發前人所未發。其民生之理想則主張土地應爲國家公有，人民受土地於國家而耕種之，即所謂耕者有其田。王者之一切制度均係爲民而設，故民皆悅而從之；霸者則惟以武力征服人，強使從己。所謂王霸之辨，實即義利之辨。孟子最重視學校教育，嘗曰：「謹之以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」以爲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，爲人生最大樂趣。因爲孟子辨護教育的尊嚴，故於師資主張嚴格，嘗曰：「人之患在好爲人師。」孟子理想中之教師可稱爲大丈夫。其言曰：「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，得志與民由之，不

得志獨行其道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。」先秦諸子其抱負宏偉，態度積極，革命思想最濃厚，而能爲崇論宏議者，殆莫如孟子。

(三) 荀子

(元前三〇——二四五)

孔子以後，孟子荀子是儒家中兩位齊名的大師。近人以孔子與孟有之關係，比之於希臘三大哲人。孔子建樹之大，當然遠過於蘇格拉底。孟子高明豪放，頗似柏拉圖。荀子篤實謹嚴，頗似亞里士多德。孟子爲始倡仁義之學者，荀子則可稱禮學大師，二家學說可以互相補充。荀子一書大旨在崇禮而勸學，不僅禮論一篇爲然。大小戴禮記純講禮學，而其書時襲荀子，故謂禮學成於荀子，自無不可。孔子言直，又言禮，言直則注重個人性情之自由，言禮則注重社會規範對於人生之節制。荀子之貢獻在於進一步作理論研究，以說明禮之性質，及其對於人生之關係。中庸之觀念爲孔子所已有，荀子禮學在講明度量分際，以達到中的標準。荀子又重樂，謂「聲音之入人也深，其化人也速。」由禮言之謂之中，由樂言之謂之和。去樂以言禮，禮失其中，去禮以言樂，樂失其和，二者相合，教化乃備。

孟子道性善，荀子道性惡，其理論根據雖不同，但其注重教育則完全一致。荀子所言之天是自然的天，其中並無道德的原理，與孟子所言義理之天異。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在於是非之心等善端。荀子則以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在於人有優秀之聰明才力。故荀子以爲道德乃人爲的，嘗曰：「人之性惡

，其善者僞也。」此所謂僞，指爲善之爲，非誠僞之僞。荀子曰：「聖可積而致，」卽是此意。宋明學者言性，分別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，而戒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，蓋已兼取孟荀二義。宋明道學有程朱陸王二派之對立，其所言修養方法亦異，其實仍是孟荀二家學說之推演。陸王宗孟子，程朱宗荀子，影響極爲深遠。（朱子雖推崇孟子，其學理實與荀子爲近。）小戴記中大學一篇，在中國教育史上有極崇高之地位。大學所言三綱領，（明德、新民、止於至善，）八條目，（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）爲理論極完整之教育哲學。大學雖非荀子所著，但就學術系統言，則爲荀子之學。

荀子曰：「人之命在天，國之命在禮。」禮卽社會與政治之制度。又曰：「禮者法之大分。」禮治實際卽爲法治。賈誼謂：「禮者禁於未然之前，法者施於已然之後。」實則法不必後，禮不必先，異名同物，相爲轉注。然禮治可以包含法治，而法治不能代替禮治，此卽儒家與法家根本區別之所在。荀子曰：「兼併易爲也，惟堅凝之難也。」兼併政策可用法治，而堅凝作用必賴禮治。能兼併而不能堅凝，則雖能建立偉大之帝國，最後仍不免於崩潰。戰國時代中國之統一運動已成爲國民堅強之要求，惟法家急功利，尙兼併，儒家重禮義，貴堅凝。孟子曰：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」荀子屢言秦之所以治，終言秦之不用儒術，舍本索末，必致敗亡。（見儒效、疆國等篇）荀子在戰國末年，最爲老師，韓非李斯俱事荀子，後來儒者多出其門。但李斯韓非皆背其師說，而爲法家的健將，秦代的功臣。蘇軾欲以此蔽罪荀子，殊爲不當。秦代敗亡甚速，中國統一的規模，至漢武帝時始大定。當時立國的基礎，不在武力的兼併，而在文化的統

一。二千年來，中國文化以孔子爲中心，早已堅凝爲一。代表漢代精神者是董仲舒，所以孟子荀子之未曾完成之志業，落在西漢儒家董仲舒的肩上。

(四) 董仲舒 (元前一七九——一〇四)

董仲舒爲西漢學者第一人。下帷發憤，潛心學業。景帝時，以治春秋爲博士。武帝時以賢良文學對策，卽著名之天人三策。綜其旨趣，第一策言教育爲建國之本，第二策言開設國立大學之重要，第三策言教育必須有中心思想。其言曰：「漸民以仁，摩民以義，節民以禮，教化行則習俗美。」孔子與孟荀之遺教，實可以仁義禮三字概括之。又曰：「正其義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。」其注重動機論，排斥功利論，尤爲後世所稱道。董子之學主張天人相與之說，以人力與天行互相感應，此亦自古相傳之人本哲學。孔子曰：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」孟子謂人力可以創造運命，荀子謂人力可以征服自然。董子則謂：「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，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。」人類應知自貴於物，明仁義，重禮節，彊勉學問，彊勉行道，然後謂之君子。此天人相與之說，乃董子教育思想之根據。

董子以爲教育人民之責任，應由政府負之。其言曰：「養士之大者，莫大乎太學。太學者賢士之所關，教化之本厚也。臣願陛下興太學，置明師，以養天下之士，則英俊宜可得矣。」(賢良策二)武帝用其言，於是國立大學正式成立，地方教育普遍推行，實爲中國教育史上至可紀念之事。而最要者乃在確定以

儒家思想爲教育宗旨。董子治春秋最有一心得，（著有春秋繁露等書）嘗曰：「春秋大一統者，天下之常經，古今之通義也。」太史公著史記，其史學見解得力於董子者非淺。孟荀與董子皆從思想上教育上奠定中國統一之基礎。董子雖是家居授徒著書，（其故里在河北景縣）獨能以其學說見諸行事。因武帝採納其言，表章六經，罷黜百家，孔子之道愈見昌明。儒家的作風自然與法家不同，漢武帝的政策與秦始皇亦絕不相同。當時的教育政策只是確定思想中心，並非催殘思想自由。故不但道家法家一類思想後來依然流行，且佛教東漸後的印度思想，亦聽人民自由信仰。但魏晉南北朝以後，佛教勢力風靡一時，而終未能搖動中國文化之根本，所以然者，卽由思想重心確定之故。董子於儒家社會倫理之中，特別提出三綱之說，「君爲臣綱，父爲子綱，夫爲妻綱」，世人或病其陳腐。我們對於古人的學說應考察其時代，具有瞭解的同情。我們試想何以佛教中國化而非中國佛教化者，卽可領會三綱之說爲我國中古時代精神上重大的堡壘，董子學說實在已盡其時代的使命。

（五）王通（五八四——六一七）

中國經魏晉南北朝長期紛亂之後，至唐代而民族復興，國威重振。爲唐代建國時期思想之前驅者，卽隋代王通。王通爲歷代教育家中最年青者，卒時僅三十四歲。蓋自弱冠入長安，見隋文帝，奏太平十二策，帝不能用，其後屢徵不起，專以著述教授爲事。於是約大義，刪舊章，起漢魏，迄隋代，纂王氏六經，

以繼孔子之志，九年而功就。其書多不傳於世，其僅存者有玄經（依春秋體例）與中說，（門人輯其語錄而成）亦非完書，殊爲可惜。然觀其精粹處，猶可略見其學說要旨。通之續經，世人多議之。王陽明以爲秦漢以降，文獻日繁，取法孔子，錄其近是之說而表章之，其事未可非議。故六經可以續，續經不爲僭，其說亦有理。通以斯道自任，其遺書曰中說，歿後門弟子諡曰文中子。其學說以執中爲要，仁義於是乎明，禮樂於是乎出，是固不失爲儒家傳統之典型。通嘗躬耕，或曰：「不亦勞乎？」通曰：「一夫不耕或受其饑，且庶人之職也，無職者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吾得逃乎？」其言之切實如此。

隋末天下方亂，通慨然有憂國之志，抱經綸之懷，期以見諸實行。通家於山西河津，凡往來於長安太原者，必道經其鄉里，從遊者甚盛。唐初將相如房玄齡、魏徵、李靖輩，皆曾沾其教澤。唐太宗曰：「玄齡從我定天下，徵與我安天下。貞觀以前從朕經營天下，玄齡之功。貞觀以來，繩愆糾謬，徵之力也。」又曰：「人以銅爲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爲鏡，可以見興替；以人爲鏡，可以知得失。魏徵歿，朕亡一鏡矣。」王通歿於隋大業十年五月，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，其時聞王氏之風而興起者，輔佐唐公，翼成貞觀之盛治，赫赫於當時，知必與其講學時期之精神有密切關係。宋儒如程子皆盛讚文中子，以仲淹（通之字）與仲舒並稱，謂其識見高明，學務實用，能識得三代制度精義。通嘗曰：「善歌者使人繼其聲，善教者使人繼其志。」他雖然盛年凋落，著作散逸，而被其教澤者多能蔚爲國器，可謂繼起有人。河汾講學稱之爲建國教育，洵非虛美。

（關於王通事迹，學者頗有辯證，其主要疑難爲房玄齡、魏徵、李靖諸人年齡反較王通長五歲至十四歲不等，以爲事經緣飾，否則舊史所載通之生平當有舛誤，以常情論，其言甚爲有見。然弟子年過其師，後世亦有之，陽明弟子中卽有其例。朱舜水在日本宏敷教澤，雖老者白髮亦多扶杖聽講，有謂「前者做昏夢，今日始知耳。」故有興起之師，有尋常之師，未可一概而論。王通在隋代屢詔不起，潛心著述，續纂六經，爲一有聲望之學者。魏徵等聞風興起，正所謂以多問於寡，實爲美談。通雖年少，可謂興起之師。王勃係通之孫，而年少英特，頗有祖風，河汾講學之功未必盡誣。清人反對講學，或譏其狂妄，則爲太過。茲存其舊說，著其疑點，其他考辨，文繁不備錄。）

（六）韓愈（七六八——八二四）

唐代儒學復興運動，由王通發其端，至韓愈而漸成熟。愈字退之，河南孟縣人，因其先世居河北昌黎，北宋時追封昌黎伯。他的重要著作是原道篇，有曰：「凡吾所謂道德者，合仁與義信之也。」在此篇中，他極力推尊孟子。在唐代佛教極盛之時，起而闢佛，殆自比於孟子之拒楊墨。（王通似未極力排斥佛老）又以孟子書中談心談性，談「萬物皆備於我，反身而誠，」以及養心寡欲之修養方法，對於佛學所討論之問題，可予以相當的解答。原道篇中他又特引大學，蓋以其中有明明德正心誠意之說，亦可認爲與當時有興趣之問題有關，故特提出。而又指出，「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，將以有爲也；今也治其心而外天下

，「以見儒佛雖同一「治心」，而用意不同，結果亦異。自經他提倡以後，孟子與大學二書，遂爲宋明道學家所根據之重要典籍，故儒家復興實兼承孟荀二派之流。

韓愈在長安國立大學兩度任教授，（國子博士），後又升任校長（祭酒）。嘗作進學解曰：「國子先生晨入大學，召諸生立館下，誨之曰：業精於勤，荒於嬉；行成於思，毀於隨。」又作師說曰：「古之學者必有師，師者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。視學問重，則其視師也必尊；視學問輕，則其視師也自忽。」他汲汲於誘掖後進，其好善之勤，愛士之篤，令人感興。其弟子如李翱輩，皆卓然有所樹立。憲宗時愈因上諫迎佛骨表，被貶謫至廣東潮州，表文有「佛不知君臣之義，父子之情」之語。至潮州後，努力興學，嶺南人文之發達，他實與有功績。韓愈乃唐代第一文豪，爲文主深探本原，刊落陳言，闡深奧衍，取六朝以來之舊文體，摧陷而廓清之，開創散文之新作風，貞和元和年間爲中國文學史上大放光芒之時期。程子稱韓退之晚年爲文所得甚多，本是修德，有德然後有言。李綱亦稱其雖務去陳言，不蹈襲以爲工，要之操履正，以養氣爲本，宜乎高文大筆，佐佑六經，粹然一出於正，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。（道鄉集序）愈自言曰：「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，則無望其速成，無誘於勢利，養其根而俟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，根之茂者其實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晔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。」（答李翱書）真正的文學家同時必是一位思想家，近人謂宋明道學奠定孔學之哲學的基礎，受老莊與印度思想之影響，而不爲所轉移，而益充實光輝，蔚爲吾國學術之正宗。就此義言，可謂中國真正的文藝復興。韓愈爲宋明道學之先驅，首倡道學之名，又

爲道統之說，則其歷史地位之重要，已可想見。

(七) 胡瑗 (九九三——一〇五九)

宋代國立大學的學制定於胡瑗之手，程頤是他在開封國學時的學生。故謂宋代道學雖至二程而精，而師道之立則始於胡瑗。瑗字翼之，江蘇如皋人，學者稱爲安定先生。幼時家貧，無以自給，往泰山與孫復石介同學，攻苦食淡，十年不歸。范文正公愛而敬之，聘爲蘇州州學教授，後又任湖州州學教授。(猶今之中學教師)他以聖賢之道自期許，以仁義禮樂、明體達用爲宗旨。在地方與學養士凡十餘年，魁傑之士多出門下。其教學之法最備，立經義治事二齋，經義則選擇學生心性疏通，有器局可任大事者，使之研究經術，以養成通才。其講述經義，常引當代事實以印證之，使識時務。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，又兼攝一事，如治民以安其生，講武以禦其寇，堰水以利田，算歷以明數，分組研習，以養成各科專家。他於閒暇教育亦極注意。一日遊歷，任湖州州學教授時，曾率學生至潼關，覽太華黃河之勝，慨然曰：「此可以言山川矣，學者豈可不見之哉？」可見其志趣所在。一日娛樂，常令學生習射投壺，每考試既罷，則歌詩奏樂，至夜乃散。他本深於音樂，仁宗景祐中，曾以白衣召對崇政殿，奉命更定雅樂。瑗一切教法皆以身先之，注重精神感化，使誠明者達，昏庸者勵，頑傲者革。先生視諸生如子弟，諸生亦敬愛如父兄。中國歷史上最有成就的中學教員，實無過於安定先生。